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111
16 January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a)和12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先生和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巴克利·瓦利·恩迪亚耶先生根据
人权委员会第1994/37和1994/82号
决议提出的联合报告

两名特别报告员1994年10月17日至26日
对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访问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8	3
一、背景和情况：自1990年以来的事态发展.....	9 - 19	5
二、生命权和不受酷刑的自由：调查结果和关注.....	20 - 54	7
A. 在武装冲突地区对生命权和不受酷刑的 自由的侵犯.....	24 - 40	8
B. 对不同政见和社会抗议的暴力行动.....	41 - 47	12
C. “社会清洗”.....	48 - 50	14
D. 暴力的其他因素.....	51 - 54	15
三、特别报告员访问的地区.....	55 - 74	16
A. 阿劳卡.....	56 - 60	16
B. 马格达莱纳麦迪奥.....	61 - 67	18
C. 考卡山谷省.....	68 - 74	19
四、经过适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75 - 102	21
A. 机构.....	75 - 76	21
B. 与具有施行处罚权力的机构的职能有关 的问题.....	77 - 102	22
五、结论.....	103 - 114	28
六、建议.....	115 - 132	30

导 言

1. 1993年7月29日,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巴克利·瓦利恩迪亚耶先生写信给哥伦比亚政府,对该国侵犯生命权的一再指控和他的前任S. 阿莫斯·瓦科先生在1989年访问哥伦比亚后提出的建议没有被付诸实施表示关注。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询问政府是否考虑请他第二次访问哥伦比亚,目的是审查自1989年以来情况的演变和对瓦科先生拟订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在1993年9月22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再次强调有兴趣访问哥伦比亚,1994年2月2日,哥伦比亚政府发出了相应的邀请。

2.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奈杰尔 S. 罗德利先生在1994年3月29日致政府的信中对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收到的指控也表示关注。他在同一信中询问政府是否愿请他访问该国。此后,1994年5月18日的普通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

3.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24日的信中向哥伦比亚政府建议,他在1994年10月17日至26日进行访问,并提议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共同进行这次访问,因为两名特别报告员认为他们之间进行合作将有益于对局势的评估和分析与保护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有关的问题。政府在1994年9月12日的信中表示同意他们在恩迪亚耶先生建议的日期进行联合访问。

4. 特别报告员在波哥大逗留8天,其间他们会见了下列政府代表:共和国总统;外交部、司法部、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全国总检察长、负责人权事务、武装部队及司法监督的检察官代表;全国首席检察官及其副检察官;调查专员及其申诉处主任;哥伦比亚治安部队高级司令;总统人权事务顾问;和平高级专员;最高法院院长;行政安全部官员;国家感化与监狱研究所主任。

5. 在波哥大的多数会议由两名特别报告员共同举行。为了最有效利用有限的时间,特别报告员分开访问了波哥大首都区以外的地区。因此,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10月19日访问了巴兰卡韦梅哈,同时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10月19日和20日前往阿劳卡,1994年10月23日和24日访问卡利。特别报告员在这些访问期间会见了桑坦德、阿劳卡和考卡山谷等北部各省的省长或其代表,检查长办事处、检察官和调查专员办事处的地区代表、地方军事和警察指挥官以及巴兰卡韦梅哈、阿劳卡和卡利等市的市长。此外,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了波哥大和巴兰卡韦梅哈的若干监狱,主要目的是会见若干囚犯,因为他们的案件根据他的职权范围已转交给他。他特地会见了已在军营被单独监禁了几个月的两名囚

犯,后来呼吁当局结束这一状况。政府在1994年11月21日的信中通知特别报告员,这两名囚犯被转到民事监狱。

6. 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在人权领域积极活动的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政治反对党派和工会的代表以及以个人身份作证的个人,他们不仅来自被访问的城市而且也来自哥伦比亚其他各省,如安蒂奥基亚、梅塔、普图马约、考卡、考卡山谷和来自马格达莱纳麦迪奥地区。

7. 特别报告员希望感谢哥伦比亚政府的邀请和在访问期间提供的协助。他们也十分赞赏不同国家当局的代表坦率提供信息。特别报告员还感谢向他们提供信息的所有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群体,特别是向他们提供个人证词的人士。特别报告员还要特别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安第斯法学家委员会哥伦比亚分会,它们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在协调会议安排方面提供了宝贵协助。

8. 本报告在第一章扼要提到以前在人权委员会的该主题职权范围内对哥伦比亚进行的访问以及自1990年以来影响该国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侵害权的事态发展的概况。在第二章,特别报告员介绍了根据访问期间收到的文件和收集的资料查明的他们各自职权范围关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通过分析局势和特别报告员访问的三个地区的因素在他们访问期间的相互联系,阐述了这些关注。在第四章,特别报告员审查了与司法职能有关的问题。最后,第五章载有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结论和改善对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的尊重的可能办法的建议。

一、背景和情况：自1990年以来的事态发展

9. 在1987年和1989年之间，人权委员会的3个不同机构访问了哥伦比亚并就其调查结果提出了报告：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¹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² 和关于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他们除了其他外均侧重侵犯人权的暴力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及法律和机构背景并向政府提出了具体建议。

10. 由当时的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莫斯·瓦科先生的访问是1989年10月进行的。他就这次访问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了一份报告(E/CN.4/1990/22/Add.1)，其中载有他从当时所存在的暴力的角度对生命权遭受侵犯进行的分析、收到的统计资料、对具体谋杀事件的描述、人口中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政府反叛乱运动及其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的评价、以及侧重下列主要关注领域的结论和建议：准军事集团对生命权的侵犯，它们是在与武装部队和警察密切合作下进行活动的；对这些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准军事集团和治安部队的成员逍遥法外的问题以及司法部门内部助长逍遥法外现象的严重缺陷；特别影响到农民和工人的社会不公正现象(E/CN.4/1990/22/Add.1, 第60-74段)。自那时以来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态发展。

11. 在加维里亚总统执政期间(1990-1994年)，与4个武装叛乱运动(约3,500名战斗人员)缔结了和平协定。因此，在1990年和1991年期间，M-19运动(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集团，后来成为希望、和平和自由政治运动)革命工人党和金廷·拉梅集团均放下武器，组成政治运动(民主联盟/M-19)。1994年4月9日与社会主义革新派缔结了一项和平协定，它是民族解放军的持不同政见集团。然而，与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组成的“西蒙·博利瓦尔”游击队协调委员会的谈判于1992年破裂，导致新的暴力。此外，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让符合大赦条件的原战斗人员恢复平民生活的努力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因此，一组遗散的M-19的前战斗人员据报导于1994年重新结合，组成海梅·卡农突击队。

12. 为了对付哥伦比亚持续不断的暴力问题，最初于1991年拟定的加维利亚总统全国抵抗暴力战略强调使用武力镇压针对国家的暴力。应该由治安部队成员采取若干措施，如在国家机构建立内部控制机制和加强区域司法制度(见下文第13和14段)，来反击侵犯人权行为。在这方面，下文第二章审查了叛乱分子与治安部队之间持续的武装冲突对人权局势的影响，尤其是对平民百姓的消极影响。

13. 继瓦科先生访问后，哥伦比亚采取了与人权问题有关的若干立法行动。

1991年,新宪法生效,其中载有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保护它们的程序,如保护法令或建立检察官办事处和调查专员办事处。进一步的立法行动涉及到司法诉讼程序,特别是在区域司法机构中推行改革。

14. 1993年第81号法案载有刑事诉讼程序法改革方案,除了其它外允许律师在区域司法诉讼程序中讯问秘密证人,即使保证他们的身份不让人知道,并废除禁止向辩护律师提供司法档案的法令。在1993年期间,宪法法院颁布了若干决定,宣布取消限制地区司法制度诉讼中的权利和保护的若干法令。例如,人身保护令状重新纳入这种诉讼,废除允许凭秘密证人的陈述作出判决的法令。1993年第104号法扩大了证人保护方案的范围,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社会和人民抗议运动提供了保障。根据1993年第61号法颁布的第2535/1993号法令修改了有关携带、拥有、购买和出售火器的准则及其登记制度,促进平民百姓解除武装。此外,1993年第30号法和1994年第107号法加强了人权教育。

15. 在治安部队内成立了管制机制和人权机构。例如,1992年在武装部队总指挥部内设立了人权股,1994年在国防部设立了人权股。1993年第62号法对国家警察进行改组,规定人权保护对于警察作为一个机构的使命至关重要,人权问题是对所有警察人员教育的主要内容。第62号法还创立了国家警察专员的职位,他将协调内部纪律控制机制,一民法专家被任命担任该职位。但是,非政府来源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人的声明,据他说他的工作受到警察高层官员抵制的限制。1993年9月9日,在行政安全部设立了特别人权股。

16. 1993年8月17日,国防部颁布第0017号指示,要求部队力量的所有成员遵守《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1993年9月6日,军事部队指挥部颁布第100-5和100-6号指示,这两项指示分别涉及到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加强旨在要求军事部队所有成员尊重人权的方案。1994年9月议会批准了提议加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法案草案。

17. 1994年8月7日,新当选的埃尔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总统上台执政。桑佩尔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承认哥伦比亚正面临人权问题。他确认逍遥法外和所谓的准军事主义³的问题为持续不断的人权暴力行为的主根源。他还公开表示他的政府将致力于解决人权危机。在1994年9月9日哥伦比亚人权日发表的演说中,总统提出了他的政府打算通过措施,同逍遥法外问题进行斗争、提供更好的保护和维护人权、消灭准军事主义、处理因政治暴力造成的流离失所问题、普及人权教育和改善哥伦比亚的安全状况。为了巩固和平,桑佩尔总统任命了一名和平高级专员,其职责是为通过谈判解决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探讨可能性和拟订提案。

18. 尽管有这些步骤和声明,人权委员会的上述机制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暴力程度并没有下降。瓦科先生1990年的评论内容在1994年仍很贴切:

“这绝不是说解释复杂的暴力问题及其繁多的原因与形式是一件易事。大量的因素,如它所涉的各种冲突,冲突中有关的大批人员,暴力形式与行为的多样性,不易作出归纳的区域性差别以及对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大批人员中政治和军事同盟的不断变化都说明了该问题的复杂性。”⁴

19. 仍在发生的武装冲突、准军事集团的继续存在、城市暴力,特别是针对人口中边缘群体的暴力、贩毒现象和维护因利用自然资源,如石油、黄金、煤、宝石等产生的经济利益继续引起多种形式的暴力。

二、生命权和不受酷刑的自由: 调查结果和关注

20. 哥伦比亚是一个具体1,200,000平方公里的国家,拥有36,000,000居民,具有世界上最高的杀人记录: 根据官方数字,在过去15年里,杀人数从1980年的约10,000人上升到1988年的20,000人,1994年估计接近30,000人。根据《公理与和平》发表的数据,在塞萨尔·加维里亚于1990年6月至1994年6月的执政期间,共9,497人因政治或意识动机被杀害: 3,202人据说在政治凶杀中丧生,4,971人在假定的政治谋杀中丧生,1,324人成为“社会清洗”的牺牲品。同期内另有5,358人据报导死于武装冲突,包括平民(438人)、国家工作人员(1,478人)和假定的战斗人员(3,442人)。在1993年7月至1994年6月期间,4,000多人据说因政治或意识动机被杀害。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10人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6人为政治杀害的牺牲品,1人属于“社会清洗”的受害者,3人为武装冲突的牺牲品。在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期间,几乎70%的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是由国家治安部队(50.28%)和准军事集团(18.98%)的成员犯下的。游击队(24.79%)和民兵(4.57%)⁵据说对其余的30%的处决负有责任。然而,在约77%的所有案件中无法确定侵犯生命权的凶手。同期内,《公理与和平》记录到436个酷刑案件。⁶此外,平均每天1人失踪,因此导致《公理与和平》报告的在1990年6月至1994年6月期间共有700起失踪案件。在许多情况,受害者据报导在失踪几天后被发现死亡。关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目前有在哥伦比亚的717起未决失踪案件记录在案。⁷

21. 在最近的年度报告中(1994年7月),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提出了1993年期间收到的起诉的概述。关于指称由治安部队犯下的对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的侵犯问题,检察长办事处忧虑地指出,收到的起诉比1992年分别上升23%和18%。对1990

年与1993年之间出现的倾向也表示关注,在此期间酷刑和凶杀在收到的起诉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在1990年检察长办事处认为属于“属于严重侵权行为”,如任意逮捕、非法闯入、威胁、虐待等与酷刑/凶杀之间的比例为1/4,而在1993年两者几乎相等。在提交检察长办事处的多数起诉中的责任归咎于国家警察(45%)和军事部队(30%)的成员。

22. 两位特别报告员在过去几年里均收到大量提到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酷刑的报告和指控以及文件,其中对哥伦比亚在几乎完成逍遥法外的情况发生这种暴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原因作了分析。两位特别报告员在大量紧急呼吁中向哥伦比亚政府转达了他们的关注和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向国际社会转达了他们的忧虑。⁸

23. 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所有参加谈话者都强调需要采取决定性和迫切步骤,处理暴力局势,上述数字已表明了其严重性。这种暴力表现在下列各个方面:治安部队和与治安部内合作的集团,特别是反叛乱活动方面,但也有为了保护特殊经济特权和利益而对人权的侵犯,包括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酷刑;暴力镇压发表不同政见和进行社会抗议的人;以及消灭被视为在哥伦比亚社会不受欢迎的人。武装叛乱分子和为毒品贩运者或大地主服务的武装集团大规模和严重的侵权行为以及极高的普通刑事犯罪率对哥伦比亚的现有气候是雪上加霜。还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土地冲突,特别是在具有土著人口的地区;武器扩散;该国许多地区缺乏有效的文职管理,其中有些地区深受经济落后之害。此外,审判制度不能发挥有效职能,结果造成逍遥法外现象,这不仅妨碍了通过惩罚对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来控制局势,而且其本身就是暴力的重要根源。下列各章节阐述了这些问题,确认它们为在哥伦比亚影响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的主要问题。

A. 在武装冲突地区对生命权和不受酷刑的自由的侵犯

24. 武装冲突地区继续是治安部队、准军事或“私人审判”集团(据说常常与治安部队合作)和武装叛乱集团的成员大规模侵犯和违犯人权的场所。特别报告员被告知,目前约16,000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反对派的游击队仍在该国不同地区的60多个“前线”积极活动。武装对抗据说在安蒂奥基亚省、桑坦德省、北桑坦德省、塞萨尔省、玻利瓦尔省和梅塔省尤其经常发生。在这些地区,武装部队据指称继续采用以“国家安全”概念为基础的反叛乱战略,根据这种概念凡已知或被怀疑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人均被视为内部敌人。根据收

到的资料,在被标为“红区”⁹的地区(叛乱份子活跃和发生武装对抗的地区)治安部队几乎视所有平民为颠覆活动的同谋者,这一指控被特别报告员会见的武装部队成员所否认。¹⁰

25. 凡被视为以某种方式(甚至叛乱份子用武力向平民百姓勒索实物或金钱)支持游击队的人均被归为“内部敌人”一类,这一概念据指称已扩大到指凡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表示不满的人。因此,工会领袖和成员、政治反对党、人权组织、社会工作者以及农民成了发生武装冲突地区侵犯人权的主要受害者。同样,许多敢于谴责治安部队侵犯人权行为的人被杀害或被迫离开居住地区。结果,侵犯人权行为的证人因害怕有生命危险,在许多情况宁愿保持沉默。

26. 造成平民死亡的军事行动包括对平民居住区狂轰滥炸和武装袭击村庄,其间受害者据说被当场打死或被绑架,要么向他们逼取情报或用他们作响导和为获取情报目的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平民常常在后来被作为战斗中死亡的游击队,向公众公布,他们的尸体被士兵穿上军装并将枪和手榴弹放在他们手中。特别报告员被告知,这种战略的目的旨在使游击队丧失其基地。用一非政府组织观察员的话来说,这叫做“以同平民百姓作战来同叛乱份子战斗”。

27. 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第三次人权报告对这一关注有同感,根据该报告,若干中美洲国家采用“国家安全”的理论,其结果是将应该是其国防和安全机构的主要盟友的平民社会变为其最强大的敌人,这种理论不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更不值得效仿。¹¹ 对于总检察长办事处来说,武装冲突每一方采用的办法,特别是这些办法尊重个人和集体人权的程度是有关它们的行动是否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28. 在这一战略中,使用酷刑似乎有两个主要目的:获取有关游击队的情报和在人民中制造恐怖。在拘留地、偏僻地区、农村地区或军营和警察局施行的酷刑据报导发生在有关是否释放被拘留者或将其交付主管审判当局的决定作出之前。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法,只有当作案者当场被抓获或由主管审判当局根据事先界定的法律犯罪行为而签发的书面法律命令才可进行逮捕。被拘留者应在被逮捕后的36小时内送交司法当局(第370-372条)。然而,通常的做法似乎是,武装或治安部队成员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抓人,对他们进行审讯并在几天后强迫他们签署一份得到良好待遇的记录才将他们送交法官。所有这些情况以及被拘留者被单独监禁的事实增加了酷刑的危险。军队或警察记录卡上将出现的逮捕日期也常常与所涉人员实际被捕日期不符合。此外,在将被拘留者送交拘留中心时通常不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检查;结果,一旦他们获释或交给司法当局处理,对逮捕负有责任的人指称他们身上的伤痕是

逮捕之前就有的。

29. 另一方面,酷刑和虐待常常是在其他侵犯人权形式的情况发生的,特别是即决处决或失踪,因此它们常常甚至没有被登记为酷刑案件。还有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一旦获释宁愿不提出起诉或报告主管当局,因为他们担心遭到报复(他们常常遭到警告不要告发他们遭受的侵权行为)或纯粹因为他们视活着得到自由为幸运。如果他们被正式起诉,用酷刑逼出来的供词常常被审判机构作为证据。

30. 若干非政府组织根据对在巴兰卡韦梅哈地区发生的183起案件的研究而编写的一份报告指出,93%的有关个人(即170人)的身体和/或精神遭到酷刑。报告说,143人的身体遭到酷刑;所有人均遭到毒打,相当百分比的人遭到其他形式的酷刑,如被关在水牢里、遭电击、酸烧、用塑料袋蒙在头上使人窒息等;136人遭到辱骂和/或受到死亡、失踪或其他暴力行为的威胁。¹² 报告还指出,在170人中,97人报告说,他们遭到一些审判当局或政府控制的组织的虐待、其中32人向巴兰卡韦梅哈检察官办事处作了报告,但没有迹象表明办事处发起了任何刑事调查;向检察长办事处报告了62起案件,但结果仅对4起案件进行正式惩戒调查。¹³ 报告还指出,有时候无法确立政府工作人员在酷刑行为中的客观责任,因为在他们参加的酷刑行为中,受害者的头被蒙上,或者他们使用不在身体上留下伤痕的办法。另一方面,没有可以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的独立法医机构。¹⁴ 报告进一步指出,通常如果有证明酷刑的医生意见,巴兰卡韦梅哈省检察长办事处开始进行惩戒性调查,由于所涉行为的性质,该案件提交人权代表。许多这些调查不会导致对负有责任的个人的制裁,因为在多数案件中,难以将责任具体到每个人。在有些情况很显然发生了酷刑而且军队负有责任,但是不能确定军队哪个个人负有责任。¹⁵ 根据人权事务检察长代表,在阿劳卡省、桑坦德省、北桑坦德省和塞萨尔省南部似乎也存在该报告描述的情况。

31. 根据从非政府组织来源收到的资料,在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期间,654人在遭酷刑后被处决。据报导,受害者的尸体有遭受不同形式酷刑的痕迹:有些是烧伤、其他是硫酸造成的伤痕或尸体残缺。妇女经常遭到奸污。在20%的这些案件中,负有责任者被查明为武装部队成员(45%)、准军事部队(30%)和游击队(9%)。

32.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治安部队还是武装叛乱集团均不尊重武装冲突地区的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相反,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驻扎在“红区”的治安部队的各军营和其他部队侵犯人权的各种报告。但是,对最近成立的流动大队的活动表示特别关注。例如,第一流动大队自1991年起在梅塔省及其附近的卡沙纳瑞和博亚卡省活动,而第二流动大队于1993年在马格达莱纳梅迪欧地

区成立。据报导，这些流动大队长时间内在该国巡逻，没有永久的基地，通常在该地区行动的各军营并不认为它们对其活动负有责任。据说，流动大队的成员对大量被迫失踪、酷刑和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负有责任。在他们采取行动期间，据报导流动大队不带身份标记或识别符号，使这种侵权行为的受害者或证人几乎无法辨明负有责任者。检察长办事处在其已提到的报告中对这一做法表示关注。¹⁶

33.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关不同武装叛乱集团成员对平民百姓犯下的侵权行为的许多报告。据说，农民被强迫向游击队提供食物和金钱。如果他们拒绝满足这些要求，他们被游击队作为治安部队的合作者杀害。他们也可能在威胁之下被强迫离开该地区。还据报导，在战斗中被俘虏的治安部队成员常常被处决。此外，试图重返平民生活的前战斗人员据报导成为其原战友的目标。游击队自己常常承认这种称为“处决”的杀害并将他们公布于众，显然为了“威慑目的”。

34. 乌拉瓦的情况尤其悲惨。在该地区，人民解放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持不同政见派别的成员据说杀害了根据1991年与政府签署的和平协定已放下武器的原人民解放军成员以及工会领袖和希望、和平与自由组织的积极份子。这反过来据说引起后者的成员的报复杀害。在1993年期间，100多人据说在这一冲突中丧生。此外，武装叛乱集团继续使用恐怖和诉诸绑架手段，以便获取资金为其活动筹资并在较小程度上出于政治原因。

35. 在某些地区，游击队据说取代并完全控制了国家政府机构。这被视为与余下活跃游击队和平谈判中的复杂因素：现在的问题再也不是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而是除了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外还需放弃权力和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36. 被人们称为“私人审判”集团的130多个准军事集团继续在哥伦比亚全国各地行动，尽管平民武装集团的法律基础，1968年第48号法已被1988年第815号法令废除。¹⁷ 第一批这样的集团据说是由大地主成立的，目的是针对游击队的经济急需而保卫他们自己和保护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主宰地位。他们主要在下列地区活动：安蒂奥基亚和科尔多瓦北部；马格达莱纳梅迪欧；梅塔省和附近的卡萨纳雷和博亚卡地区；考卡山谷省。他们也在普图马约、阿鲁卡省和塞萨尔省南部也有存在，当然规模较小。

37. 根据收到的资料，治安部队从来没有认真努力限制这些集团的活动或解散它们和解除它们的武装。相反，军方开始与自卫集团合作，将它们视为同武装叛乱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中的有用盟友。在有些地区，如马格达莱纳梅迪欧，武装集团据说在军事机构内接受培训并在武装部队直接指挥下进行活动。但是高级军事指挥部的成员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的政策是同这些集团进行斗争，并发出了这方面的指示；

这一政策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这些集团几乎被解散。

38. 1980年代期间随着贩毒影响日益上升,贩毒者开始使用准军事集团保护其试验室和用于加工可卡因的其他设施以及为了领土控制的目的。在有些省,如安蒂奥基亚、科尔多瓦、梅塔、卡萨纳雷、博亚卡和考卡山谷,这些集团为毒品卡特尔或个人毒品贩运者服务,据报道他们与当地军事指挥官有密切联系。对这些地区平民居住区的行动据说常常是由治安部队和准军事集团联合进行的。由于毒品卡特尔和个人毒品贩运者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他们的私人武装集团变成非常活跃,武器尖端的部队。过去的准军事集团似乎相对于仅局限于自己的活动地区,与过去相反,新出现的集团如设有游击战的哥伦比亚或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的集团据报道在全国领土各地积极活动。

39. 桑佩尔总统在1994年9月9日哥伦比亚人权日发表演说时承认准军事集团,特别是通过其与贩毒集团的联系是哥伦比亚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根源。他宣布了执行1988年第813、814和815号法令的战略(见上文第36段和脚注17),办法除了其他外在于通过支持全国总检察长,成立特别调查单位和对自卫和私人司法集团的成员绳之以法。

40. 在存在武装叛乱的地区无论治安部队、毒品贩运者和准军事集团之间有何种联盟,主要受害者是平民百姓,他们夹在两者有时候三个集团的交火之间。与强迫失踪、酷刑和在上述任何集团手中被法外处决的危险相比,强迫流离失所常常似乎是较小的邪恶。¹⁸

B. 对不同政见和社会抗议的暴力行动

41. 除了平民百姓被夹在治安部队、准军事集团、游击队和毒品贩运者之间,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提出批评的协会和个人也是近几十年哥伦比亚大量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不同政见和社会抗议被传统的垄断部门和毒品贩运者视为对其利益的威胁。不仅在农村地区参与反对叛乱活动的军方而且文职当局和机构的某些代表也把不同政见和社会抗议视为颠覆活动。人权积极分子、律师,特别是帮助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律师,工会积极分子、政治反对党派的成员、社会工作者等被称为游击队的前线组织,因而被视为内部敌人。他们生活在永久的威胁之中——这种威胁通过电话或书信转达¹⁹——并经常被迫离开其工作和居住地区。多年来以及最近这些积极份子被杀害人数之多令人吃惊,使这些威胁成为事实。载有一些事例的下列各段说明了该现象的严重性。

42. 关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经常收到关于侵犯人权,包括谋杀和死亡威胁的报告。在过去3年里,他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出许多紧急呼吁,敦促当局确保对人权积极分子进行保护。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不仅几乎他们会见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市政府拥有代理人地位的人均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几乎在永久的威胁中生活和工作,其中有一些人自己的生命遭到威胁。对人权积极分子进行攻击和威胁负有责任的人据报道包括军方、警察、行政安全部的成员和据报道与他们合作或依靠毒品贩运者的准军事集团。巴兰卡韦梅哈和阿劳卡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在与特别报告员的会见中非常明确表示,他们视人权集团为武装叛乱的前线组织,其目的是通过诽谤和宣传诋毁武装机构的形象。尽管如此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强调为武装部队规定的职能十分明确并不以任何种意识形态考虑而付诸实施。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与任何政治或工会领袖对抗。

43. 同样,工会成员的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遭受到各种各样的侵犯。中央工会的代表告诉特别报告员自1986年作为一个伞式组织成立以来(其中包括一系列不同部门和政治倾向的工会)1,700多名成员被杀害,更多的成员受到威胁或遭到攻击。对工会积极分子施行暴力的责任部分归咎于军方和警察或据说与他们合作或得到他们默认为准军事集团(他们认为工会活动与颠覆活动相联系,因此视这些组织的成员为“内部敌人”),部分归咎于游击队。

44. 根据对特别报告员的描述,安蒂奥基亚省,特别是乌拉瓦地区在这方面的局势特别严重。1994年,25名工会领袖在该省被杀害,16名其他人在全国其他地区被杀害。1993年据说发生了131起谋杀事件。多数谋杀系游击队所为。受害者属于代表生产香蕉的雇员的工会。其中许多人是原人民解放军战斗员。根据调查专员进行的研究,进行这些谋杀是因为人民解放军企图控制全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地方机构。农业工人工会是一个有影响的工会组织,并且是人民解放军潜在的收入来源。政府向工会提供的保护手段据说不充分。结果,许多人据说被迫离开其居住地区。对工会积极分子的暴力继续发生。几乎经常受到关于谋杀和死亡威胁的报告。最近的一个案子涉及到1994年10月10日杀害工会领袖埃尔南多·夸德尔诺,他在北桑塔德省提布在家里被绑架,据指称被准军事部队杀害。

45. 许多农民和土著组织的成员也成为治安部队、私人审判集团和游击队犯下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这些暴力行为是在土地争端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声称对某些地区拥有权利或为了旨在保护其特征和组织的活动。因此,在过去4年里至少有78名土著领袖据说被杀害。

46. 爱国联盟政党(政府与革命武装部队双边谈判的结果)自1985年创立以来

丧失了2,000多名成员,包括一名参议院议员、三名众议院议员和若干名市长和市政议员,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的受害者。调查专员1992年10月发表了一份报告,²⁰ 阐述了爱国联盟党在1986年第一次参加选举中得到人民的相当大的支持后如何逐步被传统部门视为威胁的,传统部门视爱国联盟党获得的支持为对他们的特权的打击和“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²¹ 同样,哥伦比亚共产党根据推行军事反叛乱努力的“国家安全”理论也被视为“内部敌人”。²² 对爱国联盟党和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成员实行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据说是准军事集团和受雇为大地主和毒品贩运者服务的武装人员以及治安部队的成员。对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和成员的谋杀仍在继续。1994年8月9日,共产党参议院议员曼努埃尔·塞佩达·巴尔加斯在多次收到死亡威胁后在波哥大被枪杀。²³ 1993年,这两个政党的执行委员会对武装部队指挥部内存在的称为“慈悲的一击”的计划进行了谴责,该计划的目的是消灭这两个政党的领导层。迄今,据报道其姓名被列入被杀害人的名单上的两个人被暗杀:曼努埃尔·塞佩达·巴尔加斯和何塞·米乐·查孔·佩纳。

47. 负责保护受到威胁的公民的任务的治安部队,特别是行政安全部的对策据报道不充分--相反在若干情况,治安部队本身或与他们同谋或得到他们默认为的集团据说是发出威胁的来源。因此受到威胁的人似乎不愿意寻求国家机构提供的护卫队的保护,这是不奇怪的。

C. “社会清洗”

48. 消灭人口中边际和贫困群体一直是过去15年里的现象,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城市地区。1979年在佩雷拉城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屠杀,在该城“杀手不队”杀害了若干名罪犯,此后这种形式的暴力迅速传播到哥伦比亚的其它城市:1980年传播到麦德林和波哥大、1981年传播到考卡山谷省的卡利和其它城市,1983年传播到布卡拉曼加省和马格达莱纳河麦迪欧地区的其它城市地区。自此后,“社会清洗”的谋杀据报道几乎在哥伦比亚所有各省发生。受影响最深的是安蒂奥基亚省,大西洋省,首都地区,桑坦德省和考卡山谷省。根据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消息,到1990年,每年约400人成为这种类型的暴力的受害者,1992年登记到505人被杀害。这些数字及其其它因素如常常在谋杀之前发生的威胁和凶手的作案手法表明该现象不只是个偶然的現象。

49. 除了罪犯外,人口中的其他群体凡其存在被认为不受欢迎也成为各种谋杀的目标:妓女、同性恋、乞丐、吸毒者和街头儿童。杀害之前常常施行酷刑,据指称

目的是为了无法辨认受害者(因而无法进行调查)并向上述群体发出威胁信号。若干消息来源向特别报告员表示关注,多年来,“社会清洗”日益被接受和可被接受,将其作为如何对付人口中边缘群体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对那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称为“可处理的”的说法获得合法性。

50. “社会清洗”屠杀通常由“杀手小队”进行。在过去几年里,许多不同的小分队在全国各城市出现。据报道,警察人员常常参与“杀手小队”。有时候,这些小队据说是由某一地区的店主组织起来的,目的是清除解散其存在被视为是一种威胁的人。即使“杀手小队”由私人持枪者组成,据报道警察也不干扰。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治安部队几乎从未试图解散这些小队或解除其武装和起诉其成员。在少数情况,据说提出了纪律性程序。仅在唯一案件,这样的程序导致15名警官被解雇和另外34名警察受到其它制裁,因为佩雷拉大主教谴责警察参与了1991年的“社会清洗”屠杀活动。在其它案件中,所涉警察据说已被转到该国其它地区,从而阻碍纪律性程序取得进展。

D. 暴力的其它因素

51. 哥伦比亚的整个暴力程度很高。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会见许多人指出,由来已久的武装冲突--内战和武装叛乱--和国家许多地区的国家行政机构不能发挥职能造成了一种暴力文化,在这种文化下,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分歧司空见惯。司法方面的缺陷以及国家当局没有能力为平民百姓确保安全据说在这方面特别有害。

52. 特别报告员被告知,当局已采取一些行动,降低暴力罪行的程度,包括减少平民拥有的火器数目。若干城市进行了一些项目,目的旨在分析犯罪的原因,以便更有效地执行这些措施。

53. 但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和高度贫困继续是暴力和犯罪的主要根源。若干观察家指出,不断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产生的福利并没有用来解决最基本的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人口的75%据说生活在贫困线下,13%完全文盲,而教育、保健、住房、食品和其他社会方案等方面的公共投资据说则很低。很高的行政开支和大量资金花在军事活动方面据说甚至更加削减了对社会领域的公共投资。此外,土地继续集中在大地主手中。

54. 政治动机以及与贩毒有关的普通犯罪是造成哥伦比亚暴力气氛的进一步因素。从事贩毒的武装集团据说对与解决争端有关的暴力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其它毒品贩运者,特别是麻醉品卡特尔为私人军队供资,维护其经济利益。治安部队据说

在打击与毒品贩运者有联系的组织的过程中对贫民百姓犯下了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类似于对武装叛乱嫌疑成员实行的待遇。然而，在有些情况，由毒品贩运者供资的私人部队据说与治安部队合作，特别是同武装叛乱进行斗争中具有共同利益的情况。还据报道为了同贩运毒品进行斗争的目的而成立准军事集团，有时由军方和警察人员参加。

三、特别报告员访问的地区

55. 下列章节扼要分析了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访问的3个地区的局势：阿劳卡省、马格达莱纳麦迪欧地区和考卡山谷省。这些地区不仅在最近发生了最突出和最严重的侵犯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的案件，而且也可以作为不同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

A. 阿劳卡省

56. 在阿劳卡省，政治暴力始于1980年代初，与此同时正兴起开发石油的运动。由于有可能从从事石油生产的公司获取资金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委内瑞拉与卡萨纳雷省之间，石油贮藏最丰富地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主解放军在该省均变得十分活跃。武装部队的对策是在武装冲突地区重兵驻守，在阿劳卡诺高原的几乎所有城市设营或军事基地（该省的东部地区，包括沙拉韦纳、坦美、福尔托尔和阿劳基塔等市）。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访问了阿劳卡省，他被告知，自1989年以来，武装冲突升级，导致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案件上升，其主要受害者是平民百姓。治安部队通过路障和在农村和在城市地区的巡逻继续对该地区实行控制，据报道这在阿劳卡省制造了一种永久的武装冲突气氛。反过来叛乱分子据报道通过民兵和情报服务制度和对安全部队的设施和石油公司进行袭击来控制人口。因此，阿劳卡据说成了哥伦比亚最暴力的省之一，整个城市经常处于恐怖气氛之中。根据安第纳法学家委员会--哥伦比亚分会公布的数字，在1989年至1993年期间阿劳卡省有1,115人死于暴力，平均每天2人。80-90%在暴力死亡据说具有政治动机并可能系该地区3个主要武装集团所为：武装叛乱分子、武装部队和据说与他们合作的准军事部队。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在1993年年度报告中将阿劳卡省列为国家机构被指控滥用权力严重上升的地区之一，共登记到71份该省国家机构侵犯人权的指控，比1992年增加32%。沙拉韦纳属于被谴责犯有这种侵权行为记

录的最高的10个城市之一,总检察长办事处收到18份指控。

57. 在阿劳卡的大多数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据报道是在非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受影响的是萨拉维纳、塔梅和阿劳基塔等省。这些地区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身体不受害权经常受到来自双方的威胁。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有关游击队侵权行为的报道,包括杀害治安部队或文职当局的成员;对被游击队指控为治安部队情报员的杀害;和杀害若干名警察或军事人员的女朋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的成员绑架了一些人,以便以释放他们来获取赎金,据报道这些人也被杀害。此外,特别报告员被告知民族解放军对公共官员和记者进行死亡威胁,民族解放军杀害违犯其道德准则而盗窃或通奸或吸毒的人。

58. 在农村地区,据说游击队强迫农民向他们提供青年男女加入他们的战斗行并 提供食物。反过来,治安部队据报道视住在有武装叛乱地区的全体平民百姓为游击队的支持者或甚至视为其成员,因而视他们为敌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由军方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许多报告提到在针对平民居住区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中或在不涉及到武装冲突的孤立事件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阿劳卡省的文职当局告诉特别报告员,被治安部队的游击队或自愿向他们投降的人——有时据报道是因为处决被叛乱分子处决——被军方用来充当情报活动的所谓“控制人员”和法外处决与游击队有牵连的人。在许多情况,法外处决的平民受害者被公布为战斗中被打死的游击队。这种行为主要受害者据说是农民和公民协会特别是工会的成员,工会被视为叛乱分子渗透的组织。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有关治安部队成员对这类协会的领袖和成员,特别是教师工会(阿劳卡教师协会)犯下的侵犯生命权,包括法外处决和死亡威胁的报告,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还有治安部队成员犯下的强迫失踪和酷刑,包括强奸妇女的案件。

59. 治安部队成员最近犯下的最明显的侵犯人权的案件之一是哥伦比亚陆军炮兵第19组(eveiz Pizarro)的士兵于1994年1月3日杀害10名平民百姓,大部分是Puerto Lleras村庄的渔民。这一屠杀事件据说是 对游击队的进攻的报复,同天早些时候,游击队袭击了一军事基地,3名士兵被打死。1994年1月4日,武装部队发表的新闻稿告诉公众,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导致多人死亡。然而,检察长办事处的调查导致向萨拉维纳第124号军事刑事法庭对6名军官和3名士兵提出法律诉讼。迄今,没有听说采取纪律或刑事制裁。

60. 1993年期间,在萨拉维纳地区出现一准军事集团,称为萨拉雷自卫组织”。由于其成员在行动时将脸蒙住,因此该组织被普遍称为“蒙面人”。根据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提供的信息,他们是一由农民成立的自卫团体,抵制来自叛乱分子

的压力。然而,该地区的居民告诉特别报告员,“蒙面人”实际上是军队成员。据报道,有一次当他们拘留平民时,目击者发现其中之一是炮兵第19分队(Reveiz Pizarro)的军官,其他两名是平民(原游击队战斗人员,他们在情报活动中与军方合作)。几天后证人确认的官员被发现死在军营里,表面上是自杀。特别报告员在同该省军事当局的会晤中被Reveiz Pizarro营的指挥官告知,“蒙面人”是一自卫集团,有关他们的指控夸大了宣传,因而与文职当局的说法相矛盾,根据文职当局,摇身一变成为军人的原游击队战斗员被当着该集团的成员使用。

B. 马格达莱纳麦迪欧

61. 被称为马格达莱纳麦迪欧的地区由安蒂奥基亚省、卡尔达斯省、昆迪纳马卡省、玻利瓦尔省、博亚卡省、桑坦德省和塞萨尔省内的30多个城市组成。这些城市包括巴兰卡韦梅哈、威尔切斯港、萨巴纳德托雷斯、圣维森特德丘库里和桑塔德省的卡门;安第奥基亚东北部的荣独和玻利瓦尔省南部的圣巴勃罗。在该地区,农民与地主之间围绕土地权之争是几十年来的冲突根源。在1960年代,该地区不仅经历了土地冲突,还发生了劳工纠纷,涉及到巴兰卡韦梅哈省的石油工人,主要由工会组织。同时,出现了叛乱运动,首先是民族解放军的叛乱,后来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叛乱,另外普通犯罪也上升。这一系列局势致使国家进行干扰并认为必须用军队来恢复秩序和消除暴力。以主要社会和政治群众运动为特点的局势、军事和游击队共存以及准军事集团的活动造成了新暴力的局面,这种暴力今天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全国复兴计划将该地区视为社会贫困区(缺乏公共服务、失业、文盲率高和保健差,大片贫民窟住着流离失所者等)。

62. 检察长办事处的第3次人权报告指出,巴兰卡韦梅哈和乌拉瓦是两个一贯多暴力地区,具有形形色色的冲突的历史,其中多数是武装冲突。逍遥法外的情况尤其严重,犯罪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机构对策未能改善这一局势,收到的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大量起诉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巴兰卡韦梅哈的局势甚至更为恶化,因为它虽然不是该省的首都城市但1992年提出的申诉数字最高,1993的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几乎翻了一番。不妨认为这一上升是由于更加相信国家控制机制能控制其机构。但不幸的是,所意味着的是庞大的国家存在远远未能改善暴力局势,而成了造成暴力的因素之一。显然,这里所指的国家存在超越了法律和伦理原则,而不是指行政职能本身。²⁴

63. 在巴兰卡韦梅哈的多数逮捕是由军队和警察人员进行的,包括其治安和情

报部门的人员。根据若干非政府组织编写的一份关于该地区酷刑和任意拘留的报告,在许多经过研究的案件中,被拘留者“被带到巴兰卡韦梅哈的新格兰纳达营总部的军事设施并在那里受到酷刑。在报告拘留的总人数中,43人在被拘留地受酷刑;94人在新格兰纳达营的军营里受到酷刑;52人在该营自己的设施里受到酷刑;21人首先在军事基地受到酷刑,然后被带到该营部,继续受到酷刑。据报道,在该管辖区的其他军事和警察设施也发生了酷刑”如Luciano D' luyer和Calibio 营。²⁸

64. 游击队组织的存在并实行敲诈勒索和绑架,导致在1960年代期间成立所谓“自卫集团”,他们由武装部队武装和培训,参与反叛乱运动。这些集团被认为是1980年代初出现的准军事集团(如消灭绑架者组织的出现)的雏形并继续在这此地区活动。他们似乎在下列地区尤其显著:卡门、圣维森特德丘库里、威尔切斯特港和萨巴纳德德托雷斯(桑坦德)、圣巴勃罗(玻利瓦尔南部)的农村地区和巴兰卡韦梅哈中部的石油地区。1993年底在萨巴纳德德托雷斯(桑坦德)的周围地区出现了称为“链锯”组织;他们被称为链锯组织是因为他们用链锯肢解其受害者的肢体。在塞萨尔的南部(圣艾尔伯托)和玻利瓦尔南部(圣巴勃罗,西米递)地区尽管国家军队重兵驻守,但据说仍有约23个准军事集团积极活动。

65. 在反对游击队行动的框架下,军队有时候与准军事集团从事恫吓、骚扰、谋杀和在许多情况实行屠杀,这在一些地区造成人口流离失所。例如,在玻利瓦尔的南部的圣巴勃罗,在1993年第二流动大队的“围剿”行动造成约50起家庭流离失所的案件。

66. 同时叛乱集团继续对平民百姓进行绑架和侵犯人权的行动民族解放军被指控安放地雷,特别是在圣森特德丘库里的农村地区造成肢体残缺的案件,包括儿童。在拉多拉达、卡尔达斯、博亚卡和贝里奥等大都市还存在贩运毒品问题。

67. 还据报道,普通犯罪开始上升,是巴兰卡韦梅及其所影响地区暴力的另一因素。在市中心青年组成了从事抢劫和其它犯罪活动的集团。

C. 考卡山谷

68. 考卡山谷省是哥伦比亚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在这里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存在有复杂的暴力情况。《正义与和平》发表的1993年暴力死亡人数将该省排在第三位,共有1,138人死于暴力。检察长办事处1993年收到107份起诉,比1992年少37%。但是,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卡利期间被告知,暴力程度并没有下降;在1994年头六个月期间,据说仅在卡利就发生了654人死于

暴力的事件。从7月到9月卡利平均每月报告140人死于暴力。在80%的这些案件中，受害者据说是被火器打死的。此外，市政代理人(见下文76(c)段)截至1994年5月统计到877起失踪案件。在415起的这些案件中，失踪人员的下落仍然不明。

69. 根据收到的资料，该省局势的特点是3个麻醉品卡特尔垄断一切：卡利卡特尔、以布加/图卢瓦地区为基地的山谷中心卡特尔和在卡塔戈/佩雷拉地区的山谷省北部的卡特尔。在城市地区，与麻醉品有关的暴力、普通犯罪、私人用暴力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社会清洗”是造成大量暴力死亡的原因，并常常涉及到治安部队的人员的卷入。在农村地区，对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的暴力行为是在下列情况发生的：中部和北部卡特尔的活动；治安部队与他们合作采取的行动，有时候通过准军事集团；镇压(有时也通过准军事集团)武装叛乱分子和在该地区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活动的人。

70. 属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的武装叛乱集团据说在考卡山谷的东北部和西部这两个山脉地区出没。尽管据说他们没有象在哥伦比亚其它地区那样好战，但在他们有存在的地区，平民百姓据报道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压力之中，因为叛乱分子强迫他们提供金钱和食物。结果，许多农民宁可离开这些地区。

71. 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关于治安部队在考卡山谷省进行反叛乱行动中侵犯人权的报告。这些行动一再造成农民被屠杀，然后他们被说成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游击队。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证词证实：军队和地方警察成员在对里奥弗里奥两家的13个农民在施行酷刑后将他们法外处决。²⁸其中有些受害者据报道在该市的社会公民运动中十分积极。该事件发生之日，军方宣布13名游击队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尽管检察长办事处进行了调查并证明哥伦比亚陆军Palace营的成员参与了法外处决平民的活动，但据说尚没有人被逮捕。该案件据报道正由军事司法部门进行初步调查。受害者家庭的幸存者因担心生命有危险而被迫离开这一重兵把守的地区。

72. 特别报告员在卡利会见的军事当局说，武装叛乱分子与该省的麻醉品贩运者勾结，因而获得重要资金来源。然而，若干其它来源告诉他，在该地区进行活动的军队与麻醉品贩运者以及与在山谷省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大地主之间有密切联系，该地区被省当局遗弃，少数极为富有和强大的特权阶层与贫困的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日益扩大和持久化。毒品贩运者与军队之间的勾结据指称包括保护用于加工可卡因的设施和涉及军方和准军事集团针对游击队及其被怀疑为该地区叛乱活动的支持者的联合行动。还据报道军队没有努力解散为毒品贩运者和/或地主服务的私人武装集团或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些武装集团据说对平民百姓的许多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特别是在为种植古柯而集中土地方面。

73. 特别报告员收到令人担忧的报告,其中涉及到1990年特鲁希略40多人被谋杀和与失踪和其后杀害有关的威胁,这些人的尸体被扔到考卡河,身上有遭受酷刑和肢解的痕迹。对该案件的调查证实军方情报部门 F-2 的工作人员、行政保安部、地方和省警察和军方成员参加了这些谋杀,据说他们为该地区毒品贩运者的利益服务。在1994年7月特鲁希略发生新的失踪和谋杀案件。有些受害者是1990年被杀害的人员的亲属。幸存家属成员据报道在收到警察成员和与毒品贩运者有关的人员的威胁后逃离了该地区。特别报告员被告知这些新的谋杀和威胁可能与美洲间人权委员会最近的关于特鲁希略谋杀有关的诉讼有关。1994年10月初,成立了一个由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便澄清该案件。

74. 另外,特别报告员被告知,最近在考卡山谷整个中部地区出现了称为没有游击战的哥伦比亚各准军事集团(见上文第38段)。据目击者说,该集团的成员与 Palace 营的士兵共同在该地区巡逻。人们对最近严重侵犯生命权的行为表示关注:1994年8月14日据说他们杀害了该地区的两个农民和一名地主,将他们说成是马格达莱纳的游击队的“后备”。1994年9月23日两名叛乱分子和两名农民据报道在贾梦迪被杀害,当时叛乱分子正与该地区的各种居民举行会议,军方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而军事指挥官则告诉特别报告员说,仅“伪准军事”集团是为毒品贩运者服务的武装集团,目前被拘留在波哥达的莫德洛监狱。

四、经过适当法律程序的权利

A. 机构

75. 根据哥伦比亚法律制度,侵犯人权案件中司法责任主要在于:

- (a) 普通刑事法庭,最高法院为最高法律机构。刑事诉讼由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提出,它负责直接或根据指控或请求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并向主管法院和法庭对嫌疑犯提出起诉。为此目的,它指导并协调国家警察和其他省根据法律进行的刑事调查和确保保护受害者、证人和诉讼当事方(宪法第250条);
- (b) 军事刑事法院,即军事上诉法院和军事刑事法院,它们根据军事刑法的要求审理警察成员和武装部队现役军人犯下的罪行(宪法第221条);
- (c) 行政法院,由国务委员会主持,负责审理个人因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或损害的赔偿问题。

76. 除了司法职权范围外,公共部(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政府监督机构)对保护人权也有管辖权。它由下列机构组成:

- (a) 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它是与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公务行为有关的事务方面的最高当局;行使纪律制裁权利,进行适当的调查和实行适当的处罚(宪法第277条)。因此它对政府机构行使外部体力制裁权利,独立于每一机构的内部纪律制裁权利。它可以将收集到的任何证据为有关刑事诉讼目的提交检察官和法官。
- (b) 调查专员,其职责包括维护人身保护权和提出保护诉讼,而不损害有关人的权利(宪法第282条)。尽管他的工作主要是预防、为国民提供咨询意见和公共起诉,但他也可以对提请他注意的案件进行初步调查,采取措施确保提供证据和为保护证人作出安排,即他可向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或全国检察官办事处提出的形式。在这方面,调查专员告诉特别报告员,受害者和证人经常求助他的办事处,因为他们视之为可信和客观有保证的机构,因此在其支持下其他部门,特别是检察官办事处将采取保护证人的措施。他还指出,一旦他的办事处被提请注意某一被拘留者受到酷刑,他立即对拘留地进行官方查访,因而能够对严重案件进行核实并提出适当建议。在有些情况,这种不拘形式的迅速行动比任何其他程序更为有效。他还说从1994年1月至10月,他的办事处收到138份谋杀指控、266份威胁和64份酷刑指控。
- (c) 市政代理人,他们在属于市政刑事法院和混合管辖权的法院和指派到巡回、市政和混合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内的事项行使公共部的职能(刑事程序法第131A条)。与调查专员一样,他们没有行使处罚的权利。

B. 与具有施行处罚权力的机构的职能有关的问题

77. 有关司法方面的首要严重问题涉及到制度的缺陷,具体体现是逍遥法外情况严重。逍遥法外是造成暴力,特别是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和后果。由于害怕进一步暴力,受害者和证人不敢采取法律行动,而缺乏有效的调查和惩罚导致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相信他们的行动将不会遭到惩罚。另外,缺乏惩罚,特别是对严重罪行,纯粹使人产生报复和不通过法律擅自处理的愿望。近几年非政府组织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阐述,它得到当局自己的承认,当局告诉特别报告员尽管近几年在宪法和法律事务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在同逍遥法外现象进行斗争的努力中成效甚微。

78. 尽管如此,不同机构之间逍遥法外的程度有区别。据指出,普通和军事刑事司法制度方面逍遥法外现象最高,而检察长办事处在有关其纪律职能方面和行政法院似乎正在发挥比较令人满意的职能。关于后者,据说大约有400份裁决,宣布国家对其工作人员的不规矩行为负有责任和赔偿约6000万美元。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与行政法院对国家作出不利的裁决有关的行为常常不受刑事法院的惩罚。

一般刑事审判

79. 就一般刑事审判而言,逍遥法外的有些根源属于内部性的,并与法律专业多年来被忽视和用于处理最大规模问题(全国的约2,300名刑事法官显然是不够的)的极少财物和人力资源有关。尽管自新宪法通过以来在预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刑事法院与其面临的任务相比仍十分简陋。其他原因是外部的,其产生是由于负责司法的机构规模到底是处于危机中的社会的一部分。正如已经阐明的,在这样的社会,暴力在不同的行为者之间十分嚣张,他们之间常常不和并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破坏这些机构的独立,这些机构常常是他们的目标。

80. 针对司法部门代表使用的暴力通常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多数是刑事诉讼中发生,其目的是确保调查不会有任何结果,不签发逮捕证或根本不能证明犯罪的责任。这种暴力主要采取死亡威胁和谋杀的形式(自1982年以来,司法部门的约270名成员据报道被谋杀),这种暴力还导致腐败。

81. 一些当局举例说,1992年在该国发生的28,000个暴力死亡中,刑事审判制度在审理这一严重犯罪行为方面仅作出2,717份审判,即这些案件的勉强10%,处理最严重罪行的结果仅如此而已。

82. 尽管逍遥法外问题影响到整个司法部门,但最大的问题发生在调查阶段,它是检察官办事处的责任。由于该国犯罪人数多,其任务特别困难。在国家领土的许多地区,受害者本人或证人因害怕报复而宁愿保持沉默或对暴力采取搬到另一地区的做法,因而使调查者的任务更为困难。历届政府本来应该采取决定性措施来处理这一情况,而不是容忍每年有如此多的人数逍遥法外。

83. 检察官办事处负责协调警察进行的刑事调查,为调查提供技术支持,由约18,000名工作人员组成,分布在不同的部门负责此类职能。观察家指出,将协调任务分配给检察官办事处是对新宪法通过之前的局势的重大改善,过去每个法官进行自己的调查,几乎不存在协调。然而,检察官告诉特别报告员,尚未完全实现协调。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也坚持认为需要提高检察长办事处的调查能力。非政府组织来源

则提出批评,认为给军方在刑事调查活动中规定了过分重大的作用,因为它们缺乏进行客观调查所需要的独立性。这些非政府来源认为这一职能应该完全由检察官办事处刑事调查警察司技术股进行。

84. 特别报告员听到一再批评的另一问题是保护证人问题。检察官办事处制定的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目前方案主要目的是保护其证词重要到足以破坏刑事组织的证人。相反,侵犯人权案件中的证人并非总能享受这一方案的保护。行政保安部的官员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的资源有限,因此他们不能对收到的要求保护受到威胁的人的所有要求作出肯定答复。

85. 普通刑事审判也包括区域法院,它们被正式称为公共秩序法院,对诸如恐怖主义、叛乱和贩毒等罪行的诉讼具有管辖权。非政府组织对这些法院及其运作程序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程序破坏了正常的程序。首先,对这类罪行的解释很宽,结果不仅将这些法院用来起诉主要罪犯,而且也用来起诉农民、社区、劳工和类似组织的积极分子,其抗议、政治示威和劳资纠纷常常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或支持游击队的活动。就程序而言,尽管1993年推行了改革,但法官、检察官、刑事调查警官以及甚至原告方的证人的匿名做法对于行使辩护权仍构成严重障碍。在这方面,检察官办事处向特别报告员表示认为,应该对这些法院实行监督,以避免滥用职权。

86. 在区域司法制度框架内根据紧急立法成立了军方检察官特别办事处,紧急立法赋予武装部队司法警察权。这些检察官特别办事处的主要职能实际上被设想为使军方在行使其职能时进行的行为,特别是逮捕,合法化,因为通常这些职能不属于军方的职权范围。特别报告员被告知,规定这些权利的法令被立宪法院宣布为不符合宪法,但尽管如此,军方继续行使这些职能,检察官特别办事处仍然存在。

军事刑事审判

87. 根据收到的资料,军事刑事法院对一切违反内部警察或武装部队条例的行为判重刑;资料甚至说,在涉及到普通成员的情况判决常常过分严厉。然而,在对平民百姓犯下的罪行的案件(抢劫、伤害、谋杀等),情况则大相径庭,其中很大一部分以中止诉讼程序而告终。在第一种情况,惩罚罪魁祸首符合军方本身的利益,因此容易收集证据,而在第二种情况,掩盖、不公正做法和向证人施加压力等似乎是标准做法。

88. 根据检察长办事处进行的研究,从1992年初到1994年中高级军事法院作出

7,903项裁决,其中4,304份为判决书,4,103份为对违反内部条例的裁决。然而,有大量非军事犯罪,即对平民百姓的犯罪行为,被宣布为无罪和中止诉讼程序。

89. 这些法院另一令人不安的方面是它们是由也能负责下令采取军事行动的军官组成,而侵犯人权的行為的发生与这些军事行动有关--这与军事法官独立和公正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造成逍遥法外的根源。

90. 执行任务时犯下的罪行是另一争议较大的概念,这在某些情况被用来赋予军事法庭管辖权。宪法第221条规定,“武装部队现役军人犯下的罪行应由军事上诉法院或军事法庭根据军事刑法的规定审理”。这一概念被官方解释为包括侵犯人权行为。此外,在军事行动期间犯下的非军事犯罪行为的情况,对于非武装平民犯下的罪行作为违反内部条例的部分来处理,其理由是执行任务时犯下的行为包括武装部队成员穿军装时可能作的任何事情。

91. 还据说,当武装部队的成员介入检察官办事处进行的调查时,军事法庭要求被授予管辖权;管辖权冲突过去由最高法院解决,根据新宪法现在由高级司法委员会的法庭解决,它由国会选举,其裁决通常有利于军事法院。检察官办事处对这一做法向特别报告员表示不安。

92. 关于该问题,检察长办事处在关于人权的第三次报告中说:

“军事刑事法院在审理和判决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国防和治安机构的成员方面效果不大。同时,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介入的诉讼程序给检察官办事处的调查造成的困难导致纪律性裁决被过分耽误。正如过去已经指出,对‘集体精神’概念的片面理解导致掩盖、阻碍调查、妨碍整个进程和最终阻碍声张正义。此外,在许多案件中,军事刑事法院的裁决常常与检察长办事处的裁决公然背道而驰,这使惩罚戒性处罚失去其作为威慑的作用。公共部对军事刑事法院的监督未能起到充分防止这些缺陷的作用。所需要的是彻底改组,使武装部队的成员受到审判”。²⁷

检察长办事处强调说:

“应该根据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哥伦比亚宪法的原则和价值观重新考虑诸如军事管辖权、执行任务时犯下的行为和充分的顺从等概念。应明确无误阐明这些概念只有在特殊情况才能保护武装部队的成员。以类似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因而使它们适用于与警察或军事任务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行动是错误的。”²⁸

93.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人权委员会在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次报告中指出,军事管辖权所涉及的危险“可通过控制其使用中的任何可能过激行为的规则来加以克

服”。为此,报告建议这种规章应明确取缔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行为,军事判决应与普通法院的判决相一致。在这方面,1994年6月国会通过关于强迫失踪的法案是一重大步骤,该法案规定介入这类行为的政府官员将不让军事法庭审理,不能援引充分的顺从的概念来解脱其责任。然而,加维里亚总统政府拒绝了这两项规定,认为他们不符合宪法。现政府支持有关军事管辖的第一条反对意见,认为该问题应由法官按个案决定。现政府不同意加维里亚总统有关维护充分顺从概念的反对意见。然而,参议院并没有采纳现政府的建议,而是接受了前总统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本报告定稿时,该法案正由众议院审议。

94. 总检察长指出下列方面为审查军事刑法的关键:将军事法官与指挥环节和与任何行动责任相脱离,使司法更为专业化;通过使用军事检察官来实行起诉制度;对“执行任务时犯下的行为”和“上级命令”的概念重新下定义;将机构的民事部分变为军事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公共部参加军事司法制度;对受军事法院审判的武装部队成员使用技术法律辩护程序。全国总检察官告诉特别报告员,他尤其赞成起诉制度,以及对“军事犯罪”有明确的定义。然而,高级军事指挥部门的成员则反对根据这些原则改革军事刑法并认为设立独立于指挥环节的法官特别不合适。

95. 政府和非政府来源说,围绕军事法院的问题是在该国造成紧张的问题,甚至是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建议,即军事管辖权应受到限制,均会受到军方受攻击,叛乱受纵容的指控。

检察长办事处的纪律性权威

96. 检察长办事处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三次报告指出,1993年它共收到363份谋杀控告、234份失踪控告、227份酷刑控告、416份伤害控告、175份威胁控告、87份虐待控告、冲突期间发生的12起杀害控告和两名穷人被杀害的控告。谋杀和酷刑的控告与1992年相比分别上升18.2%和23.8%。关于1993年作出的裁决(自然多数指1992年提出的控告),检察长办事处作出了与人权有关的524项裁决,平均每一案件涉及4名公共官员。15项裁决涉及大批屠杀、56项涉及到谋杀,43项涉及到酷刑,12项涉及到威胁。其中,有21份对谋杀的判决、16份对酷刑的判决和4份对威胁的判决。²⁹在1992年每一判决有两人以上被宣布为无罪,而在1993年每一判决勉强有1人被宣布无罪。³⁰

97. 根据检察长办事处的同一报告,

“1993年作出的裁决多数涉及到基层活动一级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多

数侵权行为指控的对象。正是基层活动一级与社区接触最多,因此,最容易被受害者攻击和认出。应该注意到管理阶层(检察长办事处视为属于最高一级)在作出裁决方面仅次于基层活动一级,因此可以推断,只要有可能进行调查,实际犯罪分子遭到惩罚,同时下犯罪命令的人也受到检察官办事处的严厉和认真处理”。³¹

98. 与检察官办事处一样,检察长办事处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在收集证据阶段;许多事件发生在农村、偏僻地区,证据常常被掩盖或有人试图转移调查方向。特别调查办事处对收到的起诉的约30%进行调查;其余指控通过区域和省办事处调查,根据人权事务检察官代表,区域和省办事处的效率要差得很多。

99. 关于案件的撤销问题,检察长办事处注意到最常用的理由是案件已经判决:

“常常当向武装部队获悉其成员犯下有可能导致纪律处罚的行为时,它们迅速对案件进行审判并作出有利的裁决,从而阻碍检察长办事处继续就该案件进行工作:一旦武装部队内部监督机制作出一项裁决,它享有既判案件的特权。在处理该机构的判决时,检察长办事处可要求复审,但不能作出另一裁决。这意味着虽然武装部队内部监督机制比检察长办事处行动更为迅速,它被案件的处理已证明包庇纵容和没有效力,它最终妨碍检察长办事处声张正义。”³²

100. 关于裁决的付诸实施问题,检察长办事处要求任命所涉工作人员的当局在10天内执行惩罚,否则将受到惩处。根据检察长,实际上大量裁决被拖至六个月到一年才付诸实施,但是绝大多数裁决得到执行。

101. 检察长及其副检察长在会见特别报告员时还强调需要处理武装部队内缺乏内部纪律控制的问题。这将需要:

“不必等到检察长办事处、一般刑事法院或军事法院的调查结束就作出决定,解除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严重证据的任何高级或低级官员、士兵或警察的军事或警察职务。检察长办事处不理解为什么当提出对公民犯下虐待或暴行的有证据的指控时,高层则没有象在一般士兵有牵连的政腐败丑闻或卷入有组织犯罪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同样认真、严格和注意。极为可取的作法是以榜样的方式从根源上对影响有关人的生命和自由的问题缺乏官方纪律制裁的现象进行控制或处罚,而不是通过援引缺乏外部或司法纪律制裁的简单办法,外部或司法纪律惩罚通常经过缓慢的程序才能实现,有时甚至根本不能实现”。³³1

关于最近在军队和警察营房内建立的作为内部控制制度的人权办事处，非政府组织提出批评，认为它们缺乏对被拘留者侵权行为进行调查的能力。

102. 非政府组织和市政代理人还表示关注，因为他们或地区检察长办事处收到的有关酷刑、即决处决或失踪的指控必须转送到波哥达的检察长办事处，只有这样检察长办事处才要求区域办事处进行调查。为给收集证据的进程造成重大耽误和障碍。

五、结论

103. 哥伦比亚社会被犯罪和暴力所困扰。在过去几年里尽管进行了本报告所阐述的许多立法改革和采取的其他主动行动，但该问题并没有缓解。每年发生28,000至30,000起谋杀事件。犯罪分子是为毒品贩运者和私人地主服务的武装集团；据指称与治安部队有牵连的准军事组织；“杀手小队”，有时包括不当班的警察，他们杀害被怀疑为犯罪分子或被认为“可被处理者”；武装部队和警察本身，他们杀害被怀疑为游击队嫌疑犯和被认为支持游击队的平民百姓；游击队，他们杀害治安部队成员、反对派成员，拒绝继续进行武装叛乱或继续属于叛乱集团的人以及有时候杀害平民百姓；以及普通罪犯。

104. 酷刑十分普遍，据说治安部队和准军事集团及其与他们平行的其他武装集团把酷刑当作其运动的直接部分内容。酷刑可被用来榨取情报或供词或恫吓。酷刑可发生在受害者被杀害或被强迫失踪之前。

105. 虽然政治组织结构高度集中，但在该国有相当大的地区几乎不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其原因可能是该地区主要受叛乱部队控制或因为在被称为红区的地区没有为国家的部队的行动制定具体的法律框架，这些部队习惯于我行我素。此外，治安部队的成员通常被认为与毒品贩运组织和准军事组成联盟（假如没有被他们腐蚀或腐化的话），其中有一些是武装部队自己成立的。还据报道毒品贩运组织与叛乱集团之间结成联盟。

106. 侵犯人权行为常常是在治安部队针对武装叛乱或毒品贩运者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报告员充分理解政府在与游击队和其他武装集团冲突时所面临的困难，这些集团犯下大量暴力行为并显然不尊重国家工作人员和平民百姓的生命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然而，这并不等于治安部队有理由过份和任意使用武力。没有任何理由使用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或酷刑，也没有理由任其违反行为逍遥法外。

107. 然而，哥伦比亚的侵犯人权行为几乎完全逍遥法外。军事司法要求并通常获得处理涉及到被指控侵犯人权行为的治安部队人员的案件的管辖权。军事审判制度在起诉和惩处明显不服从命令的违反纪律行为中可以很严厉和十分有效。但它在确保执行任务时犯下违犯普通刑法的行为(谋杀、酷刑、绑架)逍遥法外也同样十分有效。因此，哥伦比亚显然未能履行国际法规定的极尽全力和公正调查的义务，以便查明肇事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和对他们进行惩处。³⁴ 尽管

在若干案件中，行政法庭准予对在国家工作人员手中蒙受损失的受害者或其家属赔偿，但对同样的工作人员进行刑事诉讼的法庭则找不到判决他们的理由。这有力地表明法律机构缺乏追究侵犯人权行为肇事者的责任的意愿。

108. 那些赞成对治安部队成员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有军事管辖权的人所持论点的依据是对载于宪法第221条“与”军务有关的行为的解释。特别报告员希望表示关注是，虽然宪法规定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权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但宪法被以继续允许几乎完全逍遥法外的方式来解释。此外，裁决管辖权冲突的案件的司法最高委员会的成员由国会选举，这与司法独立于立法的根本原则不太容易协调。

109. 由于检察长办事处在关于人权问题的第三次报告中确认存在“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既定政策的说法不恰当，但他说多年来发生了大量，经常和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不能将它们作为中下级军官不规矩行为的孤立的或单个的案件来处理，而不追究民事和军事上层的任何政治责任。相反，即使不采取起诉非武装平民人口的决定，政府和高级军事指挥部门仍对其下级的行为和不行为负有责任。

110. 武装部队最高层一方面表示对人权问题很敏感和有充分的意识，而在地外的实际做法中又常常不尊重人权，对这样一种反差特别报告员继续表示关注。实际上，尽管存在明确的国际义务，但是服从上级命令的借口损坏了对这种行为的责任。这一点得到最近立法的确认，多数立法委员与前总统一样坚持“上级命令”可完全用作强迫失踪案件的辩护，根本无视有关国际标准。³⁵

111. 人们认为国家未能行使有效控制和提供安全，高级政府官员对此负有同感，而下列事实使这样一种感觉更为加剧：在一个显然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活跃和人的潜力巨大的国家，少数富人和拥有财产者与许多没有土地、失业和低工资者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实际上，这些是养成左翼叛乱和使一些毒品贩运者将自己标榜成现代绿林好汉的条件。

112. 如果国家能够在对任何国家的合法存在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自身改造，即建立法制，它才有可能重新有效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即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当然这不可能在真空中实现。需要认真努力使国家实现和平，和平的实现不能仅靠

威信扫地的军方采用刑事反叛乱技巧，而且也应通过谋求政治妥协。特别报告员欢迎新政府通过与仍然积极活动的叛乱集团谈判来结束仍在持续的武装冲突而作出的努力。和平对与在游击队活动和军事反叛乱行动领域享受人权的重要性不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113. 现政府承认存在这些问题并一再宣布承诺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承诺声明均见诸于新总统竞选演说、就职誓词和他在全国人权日的演说。总统本人和他的若干部长，特别是国防和内政部长亲自向特别报告员重申了这些承诺。

114.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起和平进程。然而，承诺尊重人权的措施是将声明和宣言付诸实施的途径和程度。下列建议旨在加强和支持哥伦比亚政府将承诺变为现实的努力。尤其要强调可促进防止进一步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措施。

六、 建 议

115. 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提高武装部队成员和一般群众对人权的意识的主动行动是值得欢迎的必要步骤，但特别报告员仍希望强调唯有效地同逍遥法外现象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善对人权的尊重，因而改善人权的享受。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对有关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酷刑的一切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调查，查明、起诉并惩处负有责任者，向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适当赔偿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这种行为重新发生。

116. 目前的军事司法制度保证了诸如即决处决、酷刑和强迫失踪等行为逍遥法外。联合国大会在《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1992年12月18日第47/133号决议)规定被指控犯有造成强迫失踪行为的人只应在普通主管法院受审，不应在任何其他特别法庭尤其是军事法庭受审(第16条第2款)。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酷刑。因此，唯一的适当步骤是将这种行为脱离军事审判范围。这应有法律明确规定。

117. 然而，民事审判制度也没有发挥适当职能。普通法院仅对所有谋杀案件的约十分之一作出判决。因此，特别报告员呼吁当局采取必要步骤，加强普通司法制度，使之在一切情况更为有效，让使用特别司法制度，如区域司法制度成为多余。为此不妨提出下列建议：

- (a) 拨出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特别是在司法诉讼的调查阶段。司法警察的职能应完全由民事实体，即刑事调查警察技术股进行。这将保证调查

的独立和改善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和证人申张正义的机会，在目前他们常常看到他们的起诉由他们指控对这些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机构调查。

- (b) 省和地区检察长办事处应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资源对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迅速和有效调查。
- (c) 只要区域审判制度存在，就应该对属于该管辖权范围的罪行作明确界定，以避免将构成合法行使政治不同意见和社会抗议的行为当作“恐怖主义”或“叛乱”的情况。此外，在区域法院的被告必须享有充分尊重他们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应该消除目前存在的严重限制，包括影响行使人身保护令权利的限制，人身保护令是保护被剥夺自由的人免遭酷刑的重要程序。
- (d) 应该对司法和公共部的所有成员提供有效保护，使他们的生命和身体不受伤害，不受到任何威胁和不良企图，应该对这种威胁和不良企图进行调查，以便确定其来源和酌情提起刑事和/或纪律诉讼。
- (e) 同样，应酌情向在涉及侵犯人权的诉讼中提供证词的人给予有效保护。

118. 由法医科学的专家挖掘和评估属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的受害者的遗体是上文提到的进行彻底调查的义务的组成部分。它们必须由法医考古学、人类学、病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专家按最高的专门知识标准进行。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希望提到载于《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手册》(ST/CSDHA/12和Corr.1)的《掘出并分析死骸的准则范本》，这是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犯罪预防和刑事审判部门散发的文件。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确保在全国提供必要的法医专门知识和发射特性分析以便在每一调查的案件中获得尽量多的证据。

119. 此外，许多观察家认为给军事单位规定检察官特别办事处的制度实际上是给掩盖武装部队的行为穿上合法的外衣，武装部队的行为旨在确保他们捕获并试图起诉人的在所谓由匿名法官和官方证人运作的区域法庭得到成功审判。正如上文已经提到并根据上文第86段提到的宪法法院的裁决，这些行动，包括逮捕和为起诉收集证据应完全由民事司法警察进行，因此没有必要让这些专门办事处继续发挥职能。

120. 关于军事审判制度，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它符合有关国际文书要求的独立、公正和称职的标准。特别应该充分注意1985年8月26日至9月6日在米兰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旋经联合国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

32号决议及1985年12月13日第40/146号决议核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因此除了其他外根据检察长办事处提出的建议对军事审判法进行重大改革将是前进的重大步骤。这些改革将需要包括下列内容：

- (a) 明确区别从事军事活动与参与军事司法的两种人，后者不应该作为正常指挥部门的一部分；
- (b) 重新组建军事法庭，由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组成；
- (c) 保证负责调查案件和案件起诉的人也完全独立于正常的军事领导结构并具备专业资格，如果不是实际上的检察官办事处的专门机构的话。应该给他们充分的人力和物力来完成其职能；
- (d) 关于国际法所指的罪行，如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酷刑和强迫失踪，取消以服从上级命令作为辩护的理由；
- (e) 充分执行最近的宪法法院裁决，其中要求受害者及其家属参与；和
- (f) 明确排除军方对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酷刑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管辖权。

此外，裁决民事和军事审判制度职权范围冲突的机构应该由独立、公正和胜任的法官组成。

121. 即使迅速执行这样的改革，历史上积压下来了逍遥法外问题仍存在，必须予以处理。特别报告员认为现在正是建立可以为过去拨乱反正的机制的时机。这样一种机制应能够实现下列目标：

- (a) 向公众充分说明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范围和程度以及造成其罪犯逍遥法外的政治和体制因素；
- (b) 正式查明个人对这种罪行的责任，包括直接的犯罪分子和那些可能直接或间接下令犯下这些罪行的人；
- (c) 提起相应的刑事和纪律诉讼，由主管机构执行；
- (d) 保证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有效赔偿，包括充分的补偿和平反措施；
- (e) 提出有助于在未来防止进一步违反人权行为的建议。

122. 政府通过对职位的任命、晋升和职位解除已有权以确表明它将不能容忍其自己的部队犯下的罪行。指挥环节的责任是，承认问题的存在，能够正式查明责任在于谁并相应的使用其权力。在一些孤立的情况，政府在过去决定解除卷入侵犯人权行为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这样做的权力载于宪法第189条。然而，这种权力的行使并不能代替在这些案件中根据上述国际义务实行的任何其他纪律制裁和刑事起诉，这种国际义务是调查、起诉和惩罚有责任者、提供适当赔偿和防止侵犯人权行为的

重新出现。总之,一旦检察长办事处或检察官办事处开始对治安部队的成员进行涉及侵犯人权行为的正式纪律或刑事调查,应该暂时终止他们的现行职务。此外,为晋升而对治安部队人员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尊重人权应该被列入适用的标准。

123. 武装部队进行的反叛乱行动必须充分尊重平民百姓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呼吁当局保证军事人员的匿名在他们犯下非法行为时不会为逍遥法外开方便之门。

124. 必须要求武装部队作为优先任务采取有效行动,解散武装集团,特别是准军事集团并解除其武装,其中许多集团是由他们建立的和/或与他们密切合作的。鉴于这些集团犯下了大量侵权行为及其非法性质,这是一项绝对必要的任务。此外,这样将有助于重建武装部队的威信,恢复它作为法治的公证维护者的形象。它也将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在有关国际标准规定的范围内把垄断武力的使用的必要性变为现实的开端。

125.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加强解除平民百姓的武装的努力并提高其效率。严格控制平民拥有武器是降低哥伦比亚普通犯罪和暴力程度的重要措施。

126. 鉴于在第一线的武装部队倾向于将旨在改善社会和经济条件,特别是农村和土著人口的条件的人权积极分子、工会和公民组织的活动视为支持叛乱,最高政治和军事当局必须重申这种活动是合法和必要的。实际上,威胁国家的是侵犯人权者而不是谴责侵犯人权行为的人。这方面的公共声明可以帮助创造更有利于开展这种活动的气氛。

127. 虽然特别报告员承认对受到侵犯人权行为威胁的所有人提供有效保护需要大量资源,但他们有义务建议大量增加对某些易受害群体,如受侵犯人权威胁的群体、流离失所者、街头儿童、工会积极分子和土著群体的保护措施。应该与面临侵犯人权危险的人进行协商,以便为每一情况确定最恰当措施。这种措施可包括扩大现有证人保护方案或为受到威胁的人挑选的保安人员供资。特别报告员认为现有外国资源应用于该领域。对于已经受到威胁的人,特别是死亡威胁,除了保护措施外,还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查,已确定威胁的来源并根据有关国际文书对肇事者提出起诉。

128. 特别报告员承认如果可以实现和平,这将为在哥伦比亚改善人权状况创造最有利的环境。因此他们敦促武装冲突各方认真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并建议如果各方认为这样做有帮助,联合国将愿在这一进程中提供协助。任何这样的和平协定均不得对在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内为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声张正义制造障碍。应该充分保护已放下武器和意愿重新恢复平民生活的人,特别是前战斗员,让他们自己组成政治运动,参与民主进程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129. 议会批准《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最近决定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是使政府部队与叛乱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人性化的努力。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一步骤并呼吁冲突各方遵守《议定书》的条款,包括禁止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所指的规定的行为。

130. 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当局采取措施保护受到“社会清洗”屠杀的危险的人,特别是街头儿童。这种措施可包括帮助和教育方案,以及对边缘群体自己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支持。

131. 尽管历届政府进行了立法改革和采取了其他主动行动,但是出于政治原因和一般犯罪的暴力在最近的过去不断上升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1987年、1988年和1989年访问哥伦比亚的联合国各人权机制的代表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没有被付诸实施。军方继续对武装部队成员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行使管豁权。现政府承认人权情况严重,已查明了其根源,尤其是逍遥法外问题,并一再表示愿采取根本措施解决人权问题。显然政府将会碰到来自保护其利益的力量强大的各方面的抵制。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支持政府将阐明的政治意愿变为现实的努力。人权中心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在人权高级专员指导下应考虑哥伦比亚政府帮助它执行上述建议的任何要求。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它已经就人权问题向政府提供帮助)参与该进程。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非政府人权组织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需要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保护。它们对人权协助方案的参与至关重要。

132. 人权委员会尤其应该密切注视哥伦比亚的人权状况,以便指定(除非在不久的将来人权状况有迅速改善)能确保长期监督人权状况和提出报告并能与技术援助方案密切合作的特别报告员。

注

¹ 见特别报告员, P. Kooijmans 的报告 (E/CN.4/1988/17/Add.1, 第8-12段)。

² 见E/CN.4/1989/18/Add.1号报告。

³ “准军事主义”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指第36-40段描绘的各集团进行的活动。然而,当局包括共和国总统常常将这些集团称为“私人审判集团”。

⁴ E/CN.4/1990/22/Add.1, 第5段。

⁵ “民兵”的名称用来指主要在城市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的武装集团。

⁶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中被一再告知,酷刑事件常常没有遭到谴责,特别是当发生在失踪或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之前。因此可以假定,酷刑事件的数字也远远大于《公理与和平》公布的数字。

⁷ 见关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95/36),第126-136段。

⁸ 见关于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3/46,第185-215段和E/CN.4/1994/7,第220-238段)以及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3/26,第112-116段和E/CN.4/1994/31,第173-188段)。

⁹ 特别报告员被告知,“红区”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而只是由治安部队在实际中对武装冲突地区的称呼。

¹⁰ 见第下文第42段。

¹¹ 见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的第三次人权报告,第47页。

¹² 《巴兰卡韦梅哈及其周围地区的酷刑和任意拘留》,1994年8月,第7和9页。

¹³ 同前引,第14-15页。

¹⁴ 同前引,第15-16页。

¹⁵ 同前引,第21页。

¹⁶ 总检察长办事处将这种做法称为“国防军流动大队的不幸习惯”,第三次报告,第18页。

¹⁷ 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主持下的政府采取的同准军事主义战斗的立法行动还包括第813/1988和184/1988号法令,这两项法令分别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和同准军事集团战斗的1,000人特别部队。此外,第1194/89号法令规定惩处筹划、资助、培训或参与雇用谋杀(准军事)集团的人。

¹⁸ 关于流离失所问题,见秘书长的代表,法兰西斯·邓格先生1994年10月3日的报告(E/CN.4.1995/50/Add.1)。

¹⁹ “sufragio”,是一张通知某人死亡的纸片,它一再被用来转达死亡威胁。

²⁰ Jaime Cordoba Trivino: Informe para el Gobierno, el Congreso y el Procurador General de la Nacion. Estudio de casos de homicidio de miembros de la Union Patriotica y Esperanza, Paz y Libertad, October1992。

²¹ 同前引第65页。

²² 何塞·马利亚·科尔多瓦将军军事学校于1985年12月为武装部队编写的题为“知道我们的敌人”的教材将哥伦比亚共产党(自1957年以来获得合法地位)被列为军方的敌人,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叛乱集团相提并论。若干非政府组织,包括人权组织也被该手册列为共产主义“前线组织”。

²³ 关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获悉曼努埃尔·塞佩达·巴尔加斯被杀害后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当局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查明负有责任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强调了他的呼吁,在1993年和1994年期间的若干紧急信件中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有效保护爱国联盟党和哥伦比亚共产党成员(见E/CN.4/1995/61号文件,第四章,关于哥伦比亚部分)。

²⁴ 同(脚注11)第28页。

²⁵ 同前引第9页。

²⁶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据为他的职权范围规定的程序于1994年6月3日将该案件转交哥伦比亚政府(见E/CN.4/1995/61,第104段)。

²⁷ 全国总检察长办事处,前脚注11,第17-18段。

²⁸ 同前引,第73页。

²⁹ 同前引,第32页。

³⁰ 同前引,第34页。

³¹ 同前引,第34和36页。

³² 同前引,第36页。

³³ 检察长1994年9月9日在全国人权日的演说。

³⁴ 关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酷刑问题,该义务载于除了其他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条第3款);关于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5号决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保护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的一套原则(大会1988年12月9日第43/173号决议(原则7));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第7条和第22-26条);《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34号决议)。

³⁵ 见《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条第3

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6条第1款;《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原则3;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原则26。

XX XX XX XX XX